

南通当年棋人棋事

□何美红

当下,犯罪悬疑剧《棋士》正在热播。该剧以围棋为隐喻,将人性置于社会剧变的棋盘之上,收获诸多好评。提及历史上的围棋,南通似乎鲜少进入大众视野。然而,依据《南京体育小史》记载:“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围棋史上的黄金时代,扬州、无锡、苏州、南通、南京都是高手云集的地方。”循此线索查找史料,会发现不少与围棋相关的南通人和事,值得我们品味一番。上图左起:《清稗类钞》有关李湛源的内容;1914年2—4月,上海《时事新报》连载南通棋社所抄董鹿泉未刊刻棋局;青年吕思勉为周小松著《浪淘斋棋评》录有与李湛源的7局棋,此为其中之一。

近代棋坛上的南通之星

先来聊一位孤高逸世的棋界侠者李湛源,名许清,字海门,号湛源、漪园,生卒不详,通州石港人,活跃于道光、咸丰、同治年间。《清稗类钞》有关他的短文三篇,内载道光六年(1826)通州知州周介堂(岱龄)考州县诸生,曾问他有何特长,李答“善弈”。知州于是设局对弈,“至漏三下,周遽敛袖曰:‘吾不如也!’”李从此遂有弈名。李湛源曾往扬州、安徽等地交流棋艺,后居北京,与秋航、沈介之并称“京师三国手”。

李在其为《怡怡堂围棋新谱》所撰跋文中曾有自述:“秉性拙朴,喜闲静而厌尘嚣,……寄情于弈”。史料记载:李为人豪爽,不修边幅,衣敝履穿,“咸同时奕(按:通弈)风尤盛,王公大人每邀致高手以为娱乐”,以围棋标榜自己清雅或艺高。与他同游京城的国手,在与权贵对弈时常假意败北,以取得厚贿。如沈介之就颇得此道之力,以弈取悦当朝大臣,竟能官至广西巡检。而李湛源“性疏放而桀骜”,将围棋视为神圣之事,对此不以为然,“不以利动其心”,常不顾对方颜面,不仅“科头跣足如平时”,更是将其杀得大败。因其棋名很大,甚至有王公大人不惜重金,“使人阴贿之,求其让一二局以全名誉”。李湛源表面答应,一旦对局则“取胜如故”。对于悔约的质问,李湛源大声回击:“我固不贪尔贿也”。民国裘毓麟称“弈家不藉弈为稻粱谋者,惟湛源一人”。则其傲岸孤峭之风可知,是一位真正的弈人。李湛源晚年回到石港,贫病交加,死于破庙,“终不为权贵折腰”。李著有《弈旨》,惜未见传世,有与董(六)鹿(泉)合著《受子录》(一说《如松斋弈录》)行世。

再说勤奋铸就的棋坛高手周星垣,

名兆奎,通州城东人,与李湛源齐名,且同时成名于道光末年。曾与老将董六泉较量多局,道光、咸丰年间与后来的名家周小松对弈,互有胜负,与施省三、李湛源等也皆有对局。周家世代棋手,周星垣“家资殷富,但他却专于棋艺”,学棋非常刻苦,曾“殚精学弈,不下楼者期有六月,遂成国弈”。

来自通州的李、周二人,以其棋艺精湛,双双跻身晚清“十八国手”。又据1939年《近代奕谈》称:“十八国手名声最著者,为僧秋航……其次为李湛源”。

另一位是闹市中的棋艺隐者陈岱宾(1853—1927),又以其属虎,人称“陈寅爹”。二十岁时即已善奕,后经国手刘福山、周小松指授,苦思精研,益臻微妙。陈设林永斋香粉店于西关帝庙东廊下,与人对弈,在柜上布局,市声嚣杂,应付裕如。邻肆吆喝叫卖,他仅偶尔低声喊上几句,以致生意清淡,但他对此只是一笑置之。李岱周晋琦有“陈侯弄棋如弄丸,楸枰着尽四角利,对宾谈笑舌翻然”等句,极致推崇之意。徐昂曾为《陈翁岱宾传》。近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吕思勉曾应届寄之邀到南通国文专修科任教,自称“不善棋而颇好奕”的他有文记其“辛亥客南通,曾遇其他名手”,其间即与陈岱宾对弈,由陈约定让他三子。

黑白纵横间的南通棋事

《南通市志》所记,云清末南通围棋“棋风颇盛”,最具代表性场景是“关帝庙前对弈者甚多”。由于本地围棋名手陈岱宾“终日下棋,数十年如一日,文人崔聘臣、周晋琦、顾弁群都乐与之游”,林永斋的店堂里,无论寒暑阴晴,都有围棋棋局。邑中爱好下棋者常常聚集于此,“迭相决胜,环观者数匝”。又有崔聘臣、王

静轩、孙立言、张子玉、崔振玉、屠辛伯、僧小块7人与陈岱宾,时称“弈中八仙”,周晋琦曾作《弈中八仙歌》记之。其中,崔为著名数学家,王为本地知名画家。

市志又记“散弈在民间更不乏其人”,他们在各自的人生轨迹中,与围棋结下不解之缘。古琴大家徐立孙(1897—1969),除了具有古琴家、琵琶家、中医针灸家的身份,在围棋方面也有较高的水平;著名烈士汤景延,在1943年10月任“联抗”副司令后,因其“喜好围棋,经常与李俊民对弈”;如东的杨明(1922—2002),1940年参加新四军,同样爱好围棋。1960年10月上海棋社成立时,他成为首任社长。1980年,又担任了上海市体委副主任兼任市围棋协会主席。而范万成(1929年生)老人的回忆,让我们看到了围棋在农村地区的传承。

他与堂兄范万钧(南通籍著名作家范小青之父,后任苏州棋院主任,“棋艺在苏州市颇有名气”)幼时曾随四叔学下围棋。乡间农人教侄子学棋,从侧面反映出南通民间围棋氛围之浓厚。

顺便提及一下丹徒人徐润周(1899—1984),自1919年起供职于大生纱厂上海事务所(1951年任所长),是一位围棋名手、围棋史家,曾负责1979版《辞海》棋类词条修订。他虽主要在沪工作,但生活圈子里的南通人颇多。如因其工于诗词,而加入以南通籍人士为主的沪上诗社“剪淞社”。抗战期间,避居上海的尤无曲曾从其学棋。

民国时期,南通积极推动围棋发展。1920年,张謇兄弟等人“为挽回浇风起见,特集股五十权,以三百元为一权,筹办不赌俱乐部,内设弹子房、围棋、象棋等座,凡通人士之得发起人介绍者,概可入内游戏。”为南通围棋爱好者提供

专业活动场所。

通城的西武庙弈社(民初又称南通弈社),虽无法查考其确切的成立时间,但它在南通围棋发展史上却有着重要的地位。自1914年2月起,上海《时事新报》曾以《董鹿泉奕选》为题,连载了该社秘抄、陈岱宾所藏旧谱,该谱为“董公子手选之本,皆未经刊刻”。刊登这些珍贵的棋谱,为围棋爱好者提供了学习和研究的资料。西武庙弈社还投稿《时事新报》,与其他棋友交流围棋手法。社员周晋琦(曾锦)等踊跃参与该报举行的围棋悬赏活动,促进了围棋技艺的交流与提升。

南通民众教育馆经常举办书画展览及弈棋比赛等活动,其中“弈棋分象棋、围棋、军棋三种”,丰富了民众的文化生活。抗战胜利后,南通新生活俱乐部等机构组织的“围棋晚会”更是备受欢迎。每周日晚八时(天气渐寒后改为下午二时),在俱乐部楼上,围棋爱好者们欢聚一堂,展开激烈的对弈。活动组织者还通过报端宣传,吸引众多棋迷参与。“凡有棋癖同志,欢迎踊跃参加”“凡爱好围棋人士皆可自由参加”等话语,让围棋晚会成为了南通棋迷们的盛会。据载,“围棋晚会自举办以来,颇受棋迷者欢迎”,每次晚会都“有一番大战苦斗”,现场气氛热烈非凡。

因当年的围棋晚会“颇得各界踊跃参加,情绪至为兴奋而愉快”,于是,为“加强联络,提高研究兴趣”,南通棋人又顺势发起成立了围棋研究会,围棋名手过旭初也曾来通指导,为南通围棋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此外,南通公立中学曾将围棋作为学生的课外活动之一,江北兴业公司也举办棋会。

以上举措,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南通围棋运动的普及与发展,让围棋在这座滨江小城焕发出勃勃生机。

清代通州的武官及衙门

□王士明

自明嘉靖中倭寇之乱后,原设在通州的参将就改设为副总兵,清顺治三年(1646)仍照明旧制设武官,副总兵改称副将。顺治十八年(1661),升为大镇(狼山镇),设总兵管辖庐、凤、淮、扬四府,六安、颍、亳、泗、海、通六州凡十六营。康熙初,总兵洪诺的全官衔是“镇守江南江北狼山总辖淮扬徐等处地方总兵官都督金事”。同治八年(1869)又兼管长江水师,其品级是正二品,为实际掌握兵权的武职大员,一般简称狼山镇总兵。

总兵官统辖下,早先有中、左、右三营,分防陆汛、江汛、海汛,各设有游击以下官员,经过多次裁改调并,规模逐渐缩小,兵员亦逐渐减少。到同治九年(1870),定员只有中营游击一人、守备一人、千总二人、把总三人、外委三人、额外外委三人。旧辖十六营,此时也只辖陆营扬州营、泰州营、三江营、泰兴营等四营及水师狼右营、通州营、掘港营等三营。陆汛的布置为中军游击一人,守备一人。西关厢汛千总一人,协防额外委一人,驻石庄。东关厢汛把总一人,协防外委一人,驻石港。海门汛千总一人,协防外委一人,驻吕四;协防额外委一人,驻余西。如皋汛把总一人,协防外委一人,驻吕四;协防额外委一人,驻余西。到光绪末年,员额又稍有裁减,但官名未改。宣统三年(1911)九月十八日通州宣布光复,当时的狼山镇总兵为张士翰,年龄已有六七十岁。参与光复的许宏思当时为福山镇驻吴淞水师参将,做过狼山镇右营游击。

上述武官除总兵、游击、守备各有衙门外,千总以下都分别驻在汛地。总兵衙门在元朝时为万户府;明初为千户所;嘉靖中改参将署,又改副总兵署;清初为副将署,随改总兵署,保存下来的东花厅,部分在原南通电影院东。游击衙门二处,一在东北营,一在逸斋庵巷。守备衙门,一在州治北,一在州治东北,一在南门外教场,一在州治东南中军厅。清雍正年间还有过游击驻吕四,守备驻余西,各有衙门,以后官缺裁调,衙门也就废掉了。

蔡观明回乡办教育

□缪庭



1937年8月日寇轰炸南通,蔡观明弃家南归,经皋回到如皋,在东桥茶行当行政局长。有上海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南通中学、栟茶中学的教学经历,又有创办如皋扶轮学院的经验。著述颇丰。蔡观明教文字学和写作。于一平讲授文学史和新文学,经常赏析自己创作的新诗,他后任泰州中学校长,泰州市政协副主席,是胡锦涛同志很敬重的老师。吴一鹤教历史、地理,他著有《寄庐文草》《读荀子小识》等。缪仲华教古诗文,他曾任栟茶中学校长,是《栟茶史料》编

者之一。刘守铭1927年加入共产党,是栟茶最早的党员,也在学社兼课。初办时,教师月薪仅六元,后逐步提薪,最高时十六元。

学生自修时间和授课时间相等,以达到“吸取学校、书院、私塾之长”的目的。教材采用正续(王续)古文辞类纂本。学生每周交一篇读书札记。数月后不少学生文笔清通,能写短小的研究文章,能吟诗作赋。

学社办有《国故丛刊》,有些文章则是学生的读书札记。蔡观明有力作发

表,第一辑上有《三代诸侯称王考》,第二辑上有《广韵后附辨四声轻清重浊法之研究》,第四辑、第五辑连载《论清儒古音学之失》。

1940年10月新四军到达栟茶,学生们参加了许多集会。有几位学生离校参加新四军的训练活动。吴功文、顾善道等学生参加了革命工作。1941年1月第一期学生通过考试毕业,其中有姚洛、缪荣。新中国成立后姚洛曾任陈伯达的秘书,人民出版社副总编。缪荣在毕业当月参加了新四军。中医班的赵文虎、缪文娟等人成为栟茶名医。

1941年8月,蔡观明将学社搬迁至栟茶南郊的符家浜。然而栟茶市民纷纷迁徙,未能如期开学。仅有少数旧生在符家浜补习,直至1942年5月。蔡观明在符家浜编辑了《国故丛刊》第六辑。国故专修学社延续了三年多,最终停办。

笔者珍藏着缪荣的毕业证书。证书40×35厘米,淡黄色底纹有篆书“国故专修学社”。证书内容由蔡观明毛笔填写,蔡观明签名并盖章。盖8×8厘米“私立国故专修学社之钤印”。

如今栟茶古镇为纪念蔡观明,在景区进口门楼处建有“观明桥”。

通州师范学校 抗战时期改名坚持办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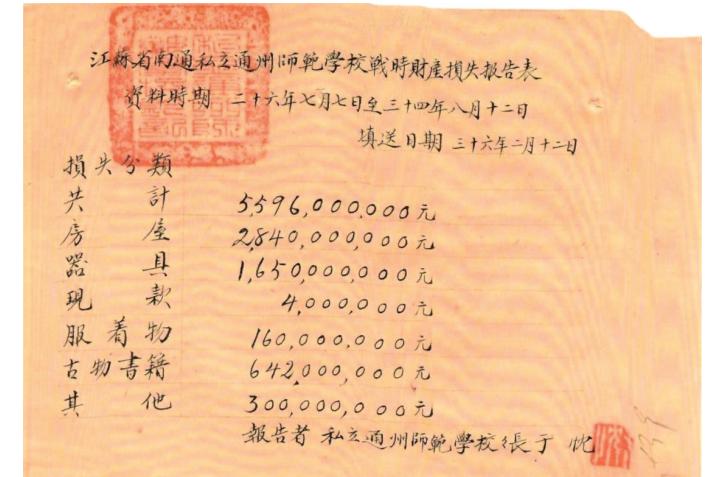
□沈付君

张謇于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考中状元,1902年即创办通州师范学校。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所民间私立师范学校,同时也是我国师范教育专设教学机构的开端,标志着我国教育事业发展进入了新阶段。该学校创办以来,“屋舍宏多,设备充实,国人皆知”。正如张謇所言:“中国之有师范学校光绪二十八年始,民间之自立师范学校自通州始。”紧接着,张謇又陆续创办了复旦公学、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省立水产学校、南通医学专门学校、南通纺织专门学校、通海农学堂等学校,为培养各类专门人才做出了卓越贡献。

1938年3月17日,南通被日军占领,学校被迫迁移到牧童乡第二附属小学,即现今的南通启东市海复镇东。为避免日军滋扰,遂以“通师侨校”的名义继续办学,继续开展师范教育。日军视县城原校址为眼中钉,疯狂破坏,因此,县城内通州师范学校的“所有校舍设备尽为摧毁掠夺”。

根据1947年3月30日民国南通县政府县长王亚武致江苏省政府、江苏省教育厅的《关于私立通州师范重报战时损失表及战前校舍图战后照片》呈文记载,民国三十四年(1945)冬,实业家、教育家张季直(张謇)创立的教养事业委员会主任张敬礼将抗战期间通州师范遭受的损失情况以及坚持教育的经过呈报民国江苏省政府。1946年,民国政府还都南京后,又按照《战时财产直接损失报告表》所列项目及时值估计进行了重新统计,并附上有关照片资料。

从中不难看出,通州师范学校抗战期间遭受的损失也尤为巨大。然而即使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该校仍坚持抗战教育,实属难能可贵。



石港华明照相馆

□施志淮

1945年,抗日战争刚刚结束,解放战争又硝烟四起。千年古镇石港,处于敌我拉锯战重要位置,是苏中四分区的南大门,南通分区军政机关曾驻于此。当时还是著名的杨曹乡“反清乡”斗争的前哨,大小规模的战斗无以计数,成为国共双方争夺的战略焦点。

1946年初,石港十字街西,新开了一家华明照相馆,门面是一间门堂屋,进去有一小天井。店房四间,约一百平方米。店内有一架立式(木质可伸降的三脚架)照相机、一套简易灯光设施和布景,照相馆的主人叫王明吉。

王明吉,石港南乡韩家坝人,1919年出生。16岁许,到人家参加门神、色光纸、木印版等制作劳动。空余时间他自学绘画,替乡间百姓画素像人像、家族祖宗挂轴等,得众人好评。1939年夏天,他去南通华美照相馆学习照相技术,同时受到进步人士的积极影响,成为新四军一师三旅的一名情报员,后结交了梁灵光(时任九分区司令员、南通县长)、陶勇(东海舰队政委)、周一峰(时任九分区政委、南通县委书记)、印建强(四分区军长、后任南通医学院副院长)等一批中共军政领导和革命友人。王明吉用照相机为他们和许多革命战士、解放区群众留下了珍贵的历史照片,此外还摄下了一些珍贵的文件材料照片。如:1947年7月,为恢复通西地区打破敌人的封锁线,梁灵光司令员仅用九分区七团一个营的战斗兵力就攻克了花市街(石港镇区西5公里)敌占据点,相关照片后用在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的《梁灵光回忆录》。印建强,南通人,1914年出生,1938年10月参加革命,1941年2月入党,历任南通警卫营副官、区委书记和区长、团政治部主任及新兵团团长等。王明吉多次为印建强战地拍照。1948年初,朱剑(原南通市委书记)调任中共南通县委巡视组兼任石区委员,发动群众,为解放南通城作准备。王明吉在工作现场为其拍照。

苏中九分区为扭转战事的被动局面,派遣王明吉同志潜伏石港,以开照相馆谋业为名,开展地下情报工作。华明照相馆,同时也为我方的一个秘密联络点。

照相馆开业后,王明吉同志在石港革命友人陈文焕(后任石港派出所所长)的介绍下,结识了镇米市桥南大街丁家瓷器店丁倩如女士(后为二夫人),两人在从事照相业的同时,隐蔽地参与革命行动。

1946年8月9日,区公所章德政(区委书记)急赶到照相馆,叫王明吉同志带快照相机,速去赌院(距镇区2公里),获取了以顾三为首的还乡团正在组织武装复辟的罪证照片,为区队和联防队挫败这次有组织、有计划的武装暴动,提供了真实的一手情报。

王明吉同志还是一位京剧爱好者,是石港良友剧社(京剧票友组织)成员,能扮演多种角色,照相馆平日下午不忙,王明吉叫丁倩如如约来此,他常邀杨中、孙思谦、朱德宽、宋树堂、王义芳等票友,到店拉拉唱唱,接特急宣传演出任务,就把照相馆提供给剧社做排练场所。之前石港良友剧社在抗战期间,就积极为宣传抗战救亡而演出,频繁地到抗日民主根据地如苏中四分区,到处留下票友们足迹。

1946年9月,石港掀起了第二次参军热潮,通城的国民党反动派试图破坏征兵任务,利用披着“票友”外衣混入剧社的周维四等人,诱骗票友、散布谣言,妄图利用有革命影响的“良友剧社”作反革命宣传。王明吉同志察觉后,即组织众多进步票友,了解情况向组织汇报,公开揭露周维四等人的谎言和用心,配合参军运动,搭台演出,鼓励社会人士和青年积极报名参军,加入革命队伍。时年,全镇1200名青年参加到分区主力部队和县警卫团,其中北渡乡有新兵一个连、自卫乡123人入伍。

1946年11月,蒋军侵占石港,王明吉携丁倩如女士撤退到通如地区打游击和负责分区战地摄影任务,几次死里逃生。照相馆一些照相器材多次被抄走,又多次被分区部队缴获送还。在那战争年代,尽管经常过着饥饿寒冷的艰苦生活,王明吉夫妇毅然拒绝敌人和一些朋友的多次劝说,仍坚持对敌斗争。

1948年石港解放,王明吉夫妇重返故里。时年2月—8月,王明吉同志任石港镇副镇长,丁倩如女士在原址恢复照相业务,1956年王明吉夫妇调省公安厅工作。1956年公私合营,华明照相馆并入石港照相馆